

## 安康与黄河早期文明

谭波才 何媛媛



新石器磨盘

###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 7000 年至 5000 年，分布于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江汉、河湟、中原、河朔等广大地区，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直根系”，而且是“王权礼仪”模式的开创者，还是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的标尺。

安康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主要是半坡类型，从出土遗物可反映出当时社会主要特征：一是聚族定居已基本形成。在马家营遗址中，发现一座以河卵石为墙基的半地穴式房子基址，该形制既符合半坡文化“半地穴式”房屋普遍做法，又有明显的“河卵石墙基”地方作法，彰显出安康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勇于创造的精神。另外，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中共发现瓮棺葬 7 座，灰坑 58 个，反映当时先民已开始以氏族为公共墓地，进行聚落定居；很有可能还出现了公共墓地，因瓮棺葬为天折未成年者，受氏族制度约束，不能埋入成人墓葬区，往往葬于居住区附近，农业受到家人呵护和照料。二是原始农业已具规模。在阮家坝、马家营、岚皋肖家坝等遗址出土大量磨制石斧、石铲、石铤、石磨盘等生产工具，特别在阮家坝遗址一罐内发现碳化粟，说明粟已打破传统认识“北粟南稻”，已从北方传到汉江流域，甚至有可能还传到汉江地区。当时除种粟外，安康还有可能兼种水稻，是“水稻北传”的重要通道。近年，有关科研机构在对紧邻安康的汉中龙岗寺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浮选，不仅发现粟、黍粒，还发现水稻谷粒。三是制陶技术日趋成熟。在阮家坝、马家营、马岭坝等遗址出土陶器中，不仅出现了瓮、盆、平底瓶等新类型，而且在纹饰上增加了变体鱼纹、宽带纹、平行条纹、三角纹等抽象纹饰，部分还还原底彩，且多为黑色彩，应为半坡文化中晚期。在马家营、汉滨柳家河遗址中，还发现了控制蛇形陶器、人面塑像等，尤其是

### 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距今约 8000 年至 6800 年，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河流域。20 世纪 60 年代，在汉中西乡县李家村发现类似文化。后来被学术界命名为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该类型距今约 7100 年至 6700 年，主要分布在汉水流域。它是承袭关中老官台和白家文化传统，在吸收陕南文化因素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类型。

据考古发现，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址中均有灰坑，并出土大量打制石斧、石铲、石铤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人群已开始定居。同时，随着生活的富足和稳定，原始艺术和神灵思想开始萌芽。阮家坝、马家营遗址出现了大量内黑外红陶、夹砂灰白陶、泥质黑陶。这些陶器虽然不论是器型，还是器表纹饰和制作工艺，都相对简单和粗糙，但为“彩陶之始”，为其后仰韶时代彩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阮家坝遗址中，还出现小孩瓮棺葬，上碗（盆）下罐（瓮），且底部留有穿孔，与半坡文化“瓮棺葬”形制基本相同。在马家营遗址一瓮葬死者头部，还放有陶罐、陶钵、石铲，说明当时人们也萌生一定丧葬观念和习俗。

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在安康的出现，说明安康及陕南人极有可能是从关东地区迁徙而来，同东亚蒙古人种；或是受关中文化影响而演变来的，属于同一文化发展类型。

人面塑像古朴拙野、惟妙惟肖，有可能是巫师或氏族首领形象，无疑说明当时陶塑艺术已开萌芽，那么在较大范围崇拜、信仰等一些独特功能。

安康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虽然非区域性，从出土器物来看，极具代表性。它是庙底沟类型庙底沟类型的钩叶圆点纹。它是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反映鱼纹转向鸟纹再向花纹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庙底沟化”正向四周强势漫延，华夏文化和民族进一步融合，“早期中国文化圈”日趋形成。学者王炜林、杨利平认为：如果说半坡文化彩陶代表一种约束性“礼俗”，只在比较小的社会集体中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在较大范围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则已成为一种“礼制”，这种寓礼于陶，以藏礼的模式，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二是陶鼎。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中共出土陶鼎 7 件，其中阮家坝陶鼎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陶鼎相近或相同；马家营陶鼎与郑州大河村遗址陶鼎、浙川下王岗遗址陶鼎接近。说明，这个时期以汉江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晚期的一类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距今约 4500 年至 3800 年，分布于豫、陕、鄂、苏、皖等地区。它的出现标志着早期中国文明已出现，社会已进入“邦（古）国”时代。

目前，在汉水上游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并不多，主要见于黑石遗址。在其遗址中，发现大量红陶片，陶色较为纯正，多为素面磨光，部分为弦纹、划纹，符合中原龙山文化“黑陶”的普遍特征，但与关中龙山文化“以灰陶为主，多为泥质，普遍饰篮纹、绳纹”的面貌大相径庭。另外，还发现了高领罐、杯、器座，同湖北地区白庙遗址等龙山文化陶器风格非常接近。当时，中原龙山文化极有可能沿白唐河南下，到达汉江中游地区，又沿着汉江溯源而上到达十堰、安康、汉中等地。

如果对照历史事件，安康龙山文化的产生极有可能与“禹征三苗”有关。当时，中华大地已形成华夏、东夷和三苗三大集团，安康属于三苗势力范围。自尧、舜以来，华夏与三苗战争不断，禹时已经进入白热化。《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

诋，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经此一役，三苗势力彻底退出江汉地区，从此再无北上争雄，而华夏集团则将势力进一步向南扩张。迄今，安康仍保留许多有关舜、禹的传说和史迹，如汉滨“禹墟”“虞帝陶渔河滨处”、旬阳及石泉“禹穴”“禹王宫”等，或许就与中原龙山文化南侵有关。

### 夏商文化

夏商时期是我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进入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开端。迄今，安康虽然发现此时期的遗存和遗址较少，但白玉石、马家营、阮家坝等遗址呈现的文化面貌和特征，足以说明安康与中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频繁，见证了夏商王朝在汉水流域的历史演进脉络。

学术界普遍认为，夏代约为公元前 210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白玉石、马家营遗址为夏代早期，呈现一定中原文化特征，如平底盘、高柄豆、直筒杯、直壁杯几乎与中原同类器型十分相似。据考证，此时期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势力达到顶点，它向安康传播的路线，基本与龙山文化传播路线相同，但往往以抢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的，进而控制通向汉江地区的咽喉要道。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代约为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046 年，分早、晚两个阶段。早商时期，汉水上游遗存以宝山文化为代表，无论青铜器，还是陶器，都带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如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夔纹、云雷纹、连珠纹、涡纹、蝉纹等，与中原商文化基本一致，还有喇叭型觚、圆（折）肩型鬲、深腹型簋等都能在中原商文化中找到。此时期，商王朝为控制广大南方地区，抢夺铜矿资源，在盘龙城建立军事据点，极有可能是盘龙城势力溯汉江而上，在汉江上游建立的据点，在马家营遗址中发现许多戮杀骸骨和乱葬坑。晚商时期，商王朝频繁迁都，盘龙城废弃，商文化整体北缩，宝山文化开始向成都平原发展，成为三星堆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夏商时期，安康地区是中原文化西进汉川、南下汉江的重要通道，也是不同来源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创新、发展的区域，表现出“泥质黑陶”“石棺墓”等独特文化个性，为后来西周文化的进入，以及方国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历史条件。



安康当代文学人物回望：

李茂询

李茂询，1943 年 3 月生于安康梅子铺。曾先后在小小学，原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1 年调入安康市群众艺术馆，任副研究馆员至退休。曾为安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安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小说、散文等作品曾在《安康日报》《安康报》发表，共计 160 余万字。其长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近期入选 2022 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入选项目。

1982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醒了李茂询多年的文学梦，在好朋友的鼓励下，李茂询又拾起了已经停了 16 年的笔。从此，一发不可收。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李茂询用来思考和创作。小说、散文、曲艺、民间故事、报告文学等一批批作品，见于中省市各类报刊。他在安康文化界的影响也逐渐增强。1986 年，当时的安康县人大、安康县委办公室和安康县志办，同时调用李茂询。最后，时任安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子美说服李茂询去了县人大常委会。不久李茂询被任命为秘书股股长，后来又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从事教育到搞行政，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重大转变。在这里他熟悉了地方行政的生活。这一经历也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后来，他的《两个秘书的终结》获得了《时代文学》杂志 1985 年度唯一的短篇小说奖。

然而，李茂询逐渐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终于，5 年后即 1991 年，被调入安康地区群众艺术馆，并担任文学干部一室中篇、短篇、小说和 100 余篇散文，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作品语言简明风趣。其中散文《326 号罪案》和《安康金漆》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他作品也多刊登在《四川》《山东》《河南》《甘肃》《江苏》等省级刊物，《陕西日报》《安康日报》《陕西日报》《安康日报》先后发表后，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肯定；而《新玉皇阁记》发表后，又被刻成石碑立于香溪景区的玉皇阁。

多年的创作使他养成了一个良好习惯：从不草率成文。为人文为文，善待之，不张扬，不炫耀，对名对利，一切淡然处之。进群艺馆第二年，李茂询加入了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又过一年，加入了省作家协会。1999 年，他被选为安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退休以后，因为时间完全属于自己，李茂询除了创作外，对中国的传统书法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对篆、隶、行、楷、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钻研，并涉猎甲骨文、金文、隶书，认识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同时注重《书画艺术》和《安康金漆》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他作品也多刊登在《四川》《山东》《河南》《甘肃》《江苏》等省级刊物，《陕西日报》《安康日报》《陕西日报》《安康日报》先后发表后，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肯定；而《新玉皇阁记》发表后，又被刻成石碑立于香溪景区的玉皇阁。

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书法创作，李茂询认为，一切名头都是外在的东西，一切都靠作品说话，一切都靠读者的认可。李茂询寡于言词，也不常与人交往，他想趁现在身体尚好，多出一两件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尤其是在一个如此安宁幸福的时代，更不想将时间白白荒废。他说，他得通过暮年努力，使自己对得起养育他的父老乡亲 and 党多年的培育与关怀。（梁真鹏）

## 《旬阳方言词典》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本报讯（通讯员 曾德强）近日，陕西省特级教师、旬阳中学原校长华开锋收到一本来自北京的获奖证书，他编著的《旬阳方言词典》被评为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类入围作品。该山花奖获奖作品 3 部，入围作品 17 部。

《旬阳方言词典》2020 年 10 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正文分词语、俗语和歇后语三个部分，收词一万余条，共 71 万字，涵盖了旬阳天文、地理、时令、农业、植物、动物、器皿用具、红白喜事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方方面面，易读易懂，索引分明，查找方便快捷；部分器具类词条附图，图文并茂，更直观生动。释义透彻，编排体例科学，既是一本实用的方言工具书，也是研究旬阳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目。该书的出版，为研究旬阳人文历史，弘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教材”，也为安康方言研究提供了范本。今年《旬阳方言词典》荣获“第六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颁发的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与电影“百花奖”、电视“金鹰奖”、戏曲“梅花奖”、舞蹈“荷花奖”等同属我国文艺界的最高奖项。



陈荣临 作

## 深阅读

## 感受文字背后的温度

——读安黎散文集《与故乡握个手》

叶松成

贫与富，书中缺乏诗意的开拓，有些描写与当下生活距离太远，开了境界描写外，还流露出一种情绪的颓废……

手头上这本安黎散文集《与故乡握个手》，我以为是一本可以品读的之书。既然可以品读，那自然应排在好书之列。安黎也写故乡，但他没有敷衍我们，因此，这本书的品相是端正的，它让我们分享的不只是句子，还有作者心目中的故乡最本原的姿态。我不怀疑安黎的真诚，因为在阅读中，能渐渐感受到作者的气息和心跳。安黎的语言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清丽和雅致，也没有那种沧桑与硬朗的质地，安黎似在以叙述者的身份娓娓讲述故乡的事，他的沉稳和坦然，还有文字中透露出的那份内敛，都让我着实惊讶，这是一个离开故乡多年的游子，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感慨潮起，而此时的他，已寄居在喧嚣市井中的一隅，并获得了这个城市的名片”。也许，这个拥有城市“名片”的人，正在被这个城市慢慢同化，就像一棵从山外移栽的树，它必须适应城市的气候和环境，按照城市的法则审慎生长，但安黎和他同时代的那一拨乡作难一样，如贾平凹、刘亮程等，都有着难以割舍的地缘和血缘情愫，那份潜藏在骨子里的乡愁，是原始的、纯正的，是丝毫做不得假的。

《与故乡握个手》，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被唤醒的记忆，那一幅幅幻灯片似的身影，从一个从故乡的土坷垃中走出的人，对像“其实早已与灵魂叠合，无须掏肠刮肚地去寻找，即是信手拈来也是原初本色。于是，记忆中的那些文字，便有了作者的痛痒在里面，而这些痛痒绝非临时性的抓挠，它沉淀在思想和情感里，既有熨帖的温暖，又有锥心的刺痛。由此，也决定了安黎笔下的故乡，在

格次和境界上显然就高出了别人一头。每个年头上，总有人在笑着度过，也会有人在哭中度过。当然，笑和哭常常是相互转化着，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哭，有可能铺垫出明天的笑；今天的哭，也有可能烘托出明天的笑，在时间的河流里游泳，没有谁没被呛过水，也没有谁不曾被猛浪击打过。（《年末的表情》）

安黎平实的表述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犹豫，却又充满着淡淡的哲学意味。这绝不是故作，更不是有意将文字抽象化，安黎勾勒的不是故乡的轮廓，安黎笔下的故乡除了本色，还有一份自我认知在里面，这与那些人云亦云的乡土手不掩怀有了本质的不同。当然，安黎的认知不是答案，即或是一些带有哲思味道的情绪书写，也只是一种意境的延续和拓展，寻着这个意境的维度，你可以猜测，也可以激发新的感触。

“故乡也许不习惯锦上添花，但一定会雪中送炭。比起都市的光洁，故乡是粗糙的；比起都市的灯红酒绿，故乡是黑灯瞎火的；比起都市的人声鼎沸，故乡是寂静无声的；比起都市的流光溢彩，故乡是简陋朴素的……故乡的聒耳，不一定能听懂你海阔天空的言辞；故乡的浊眼，不一定能读懂你云雾缭绕的心迹，但对一定会有敏锐的觉察和回应。（《回不去的故乡》）

安黎的叙述有时冷冷的，他把一种对故乡的叙述藏在文字的背后，你甚至会觉得那些文字，透出一股铁板般的森然之感。然而，一旦这些文字进入人的心灵中，它就会瞬间产生热能，慢慢地滚烫起来，烧灼起来……细品安黎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不是耽于一种对故乡的描绘，那些泛黄的记忆，他写得很粗

略和那节简。但安黎的高明，是在他不经意回望故乡时，所彰显出的他生态度，那既是世俗的，也是哲学的。他用这两种元素来完成自我剖析的过程，这种剖析虽带有自嘲、自讽的成分，但没有贬斥，而是于苦涩中透出的豁达。

“在羊的眼里，人永远属于一个捉摸不透的群体，永远不像虎狼那般直来直去；人的笑，不一定表达的是高兴，也有可能是不屑；人的爱，不一定表达的是喜欢，也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虚晃一枪……人最令羊不解的是，总是那么不消停，不那么安分，总想着要改变这个或掌控那个。得陇望蜀，挖掉树却又栽树——面对人的舞台，羊像躲在角落里的观众，一副袖手旁观的样子，只能任人折腾。（《西行记——陕西田野掠影》）”

“落后与贫穷，于人的生活是一种不幸，但于生态却是一种大幸。贪婪的心在沉睡，大自然因未受到过度打扰也在睡眠。原始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星星在闪烁，月亮脉脉含情，树叶尚且翠绿，雾霾尚未投胎。（《乡村今夕观察》）”

对于安黎而言，记忆可以是泛黄的，但人的情感和思想是不可以泛黄的。故乡的人、物、事，在轻重与取舍上，更多地倾向人事。他对记忆的寻找是辨别的，离乡背井好多年，回望却并没有陌生感。故乡的人事，是魂牵梦萦。一个没有乡愁的，是索然无味的。一个没有乡愁的世界，又哪里能获得人伦的亲情与关怀？每个人的故乡既是美好的，也是残缺的，而正因为其美好与残缺，才让我们持久而永恒地守望。安黎不仅写出了故乡的美好，也写出了残缺，灵魂的温度在文字的背后，而这一点必须用心去揣摩！



歌咏故乡、缅怀故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百写不厌的话题，故乡的意象是物质的，它是日月星辰辉映下的江河大地；血脉则是一种精神，因为它的存在，才赋予了地缘人伦亲情。因为有了故乡的概念，有了挥之不去的乡愁以及牵肠挂肚的思念……故乡也许很远，即或是山环水绕，万里之遥，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故乡仿佛还是灵动的影像，摇曳闪烁，毫发毕现。近几年，写故乡、故土的文章愈发多起来，但牵强附会者众，不少人只写出了一个空洞的外壳，细加咀嚼，其味寡淡。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日渐同质化的描写，主要表现在题材陈旧、形式雷同、思想极其